

#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

——创作概貌——

[苏] 弗·博博雷金 著  
刘循一译

北京出版社

В. Боборы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Фадеев  
твор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79 г.  
根据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

——创作概貌——

[苏] 弗·博博雷金 著  
刘循一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7,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200

书号：10071·518 定价：1.48元

## 目 次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58
第四章.....	85
第五章.....	138

# 第一章

1933年，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答巴西进步报纸的一位记者问时，关于自己的创作成长过程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我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是作家，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的创作会成为革命的创作。”这些话已被他当时和以后的全部生活和创作所证实。

法捷耶夫开始从事写作时还不满二十岁。他十六岁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不过，他的革命信仰开始形成的时间自然要早得多。当时他有一切理由对巴西那位记者说，根据自己的出身他已经是一个革命者。

法捷耶夫的父母是在彼得堡监狱中相识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一位活跃的民意党人、宣传家，屡遭监禁。安东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当时是高等学校学生，她应社会民主党人朋友们的请求，装作亚历山大的未婚妻，给他往狱中送东西。短暂的狱中会面在这两个各自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人之间产生了炽热的、浪漫主义的情谊。一年后，他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申库尔斯克——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出狱后的流放地结婚。1900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达吉亚

娜。1901年12月24日（当时他们住在基姆雷）又生了一个儿子——亚历山大。

法捷耶夫一家的生活经常是在四处漂泊中度过的（申库尔斯克、普季洛夫、基姆雷、库尔斯克及维尔诺）。安东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带着孩子毫无怨言地跟着丈夫颠沛流离。然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本人是一个家庭观念淡薄的人。夫妇俩在政治上的分歧日益尖锐和不可调和。安东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一如既往地忠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民意党人，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直到去世（服了几年苦役后，于1916年死于结核病）。这些分歧毕竟比爱情和家庭关系重要得多。1907年他们夫妇俩分道扬镳了。

一年后，安东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又嫁给了一位革命者——社会民主工党维连委员会委员格列勃·弗拉季斯拉沃维奇·斯维蒂奇。

在家里，大家叫他格列布什卡，他比安东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小很多。孩子们很快就跟他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并完全处在他的影响之下。后来亚·法捷耶夫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这些影响。

1908年，他们全家迁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来在乌苏里江畔的楚古耶夫卡村定居多年。许多年以后，法捷耶夫说：“我生长在一个座落在锡霍特山——乌苏里州的中心——山脚下离铁路一百三十公里远的偏僻的楚古耶夫卡村。这里只有几条糟透了的道路，没有电报局，一连几个月不跟外界发生联系。警察所长对楚古耶夫卡村居民实行野蛮的、残酷的统治，专横跋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拥有百

亩<sup>①</sup> 良田的富农凶残地、肆无忌惮地剥削贫农。” 富农对贫农的这种为非作歹和侮辱在法捷耶夫家里引起了强烈反应。未来的作家从小就对一切剥削者产生了刻骨仇恨。在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泛滥》中，这种仇恨心理得到了最直接和明显的反映。

1910 年，法捷耶夫进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商业学校，住在他的姨母玛丽亚·弗拉基米罗夫娜·西比尔采娃家里。他的姨母是沿海边区著名的国民教育活动家。她丈夫是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孙子。米哈伊尔·雅柯弗列维奇和玛丽亚·弗拉基米罗夫娜本人决不用忠君的思想去教育孩子们。他们的儿子弗谢沃洛德和伊哥尔成了当时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们俩都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弗谢沃洛德同谢尔盖·拉佐<sup>②</sup>一起被白卫军扔进了火车头的火仓里，被活活烧死。伊哥尔在保卫哈巴罗夫斯克的战斗中受了重伤，为了不当白军俘虏而自戕。

萨沙<sup>③</sup>在西比尔采娃家里受到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同时也得到了进行斗争的初步训练和从事秘密活动的基本技能训练。年轻的法捷耶夫不久就用上了他学到的一切。1917年初，他刚刚十五岁，就成了商业学校学生公社的领导人之一。公社在该校建立后，开展了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活动。法捷耶夫在1950年写给亚·柯列斯尼科娃的信里回忆说：

“您当然会记得商业学校的学生罢课、记得我们‘公社’在市‘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和在《学生通报》的工作，记得我们对我们学校外许许多多学生的影响……”

---

① 俄亩。——译者

② 当时远东游击队领导人。——译者

③ 法捷耶夫的小名。

“到这学年年底，我们已经同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青年论坛报》的青年工人建立了联系”。

这个工作与真正的革命活动简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1918年夏，远东发生反革命政变后不久，萨沙就被批准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布尔什维克党地下活动的积极参加者，这不是偶然的。

斗争非常激烈，你死我活，特别是在高爾察克夺取沿海边区和西伯利亚的政权以后，尤其残酷。落入高爾察克反间谍机关手中的地下工作者随时都会遭到严刑拷打和残害。稍晚些时候，法捷耶夫在《最后一个乌兑格人》里非常确切地描绘了这一点，讲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工人普塔哈被反间谍机关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故事。但在那个时候，经常不断地接近危险，只能激发他这个十六岁的共产党员的热情。常有这样的情况：青年人的激情、进行冒险和建立功勋的强烈愿望往往比清醒的思想见解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指导他们的行动。

不管年轻的法捷耶夫从老同志那里接受的任务多么重要，责任多么重大，然而他当时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这些考验对他来说还要更晚些，是在他和一群应征被动员去参加高爾察克军队的同志们跑到原始森林去参加游击队的时候，考验才开始的。法捷耶夫在自己的“履历表”中谈到了他是怎样经受这些考验的：当游击队战士和政治工作人员不到两年，十八岁担任团政委，十九岁担任旅政委……

法捷耶夫的战友T·戈洛文娜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她在人民革命军政治部组织的一次晚会上第一次听到政委讲话的情景：

“在第一排就坐的是军部成员：维列霍夫、波斯蒂舍夫、谢雷舍夫、美尔尼科夫等人，而在台上的却是一位身穿

军装的年轻政工人员，他用儿童般的嗓音作着非常漂亮的演说。这是萨沙·法捷耶夫，他形象地描述了两个世界：一方面是纸醉金迷、奢侈腐化的资产阶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产阶级保养得皮嫩肉细的手里端的不是酒，而是满满的一杯杯工人的血。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世界，劳动者用自己的双手为住宫殿的人们创造着财富。这些财富的创造者住在破旧不堪的小房子里，常常咯血。当时在这座粗糙的石头房子里创造的这些形象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坐满了战士的会议厅里，人们屏息倾听着这热情洋溢的演说，它是那样富有鼓动性，那样激情奔放，仿佛使你亲眼看到了所讲的一切，使你心中燃起对一个世界的仇恨和对另一个世界的尊敬。”

现在我们认识到，法捷耶夫的宣传才能是他的文学才能的反映。年轻政委那强烈的革命信念和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上的成熟赋予这种才能一种极特别的力量。

## 二

1921年2月，法捷耶夫由阿穆尔河沿岸游击区来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从前线来，又上前线去。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消息使代表大会的工作停了下来。法捷耶夫跟别的代表一起，出发到彼得格勒，投入了战斗。他在向喀琅施塔得冲锋时负了伤。出院时，医院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并让他退入后备兵役。

法捷耶夫迁居莫斯科后，立刻埋头于学习，并且很快就考进了矿业学院。在这个经历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在原始森林中的篝火旁过夜、在农民大会上扯破嗓子地作过演说的十九岁的青年人的生活中，这种向平静的学习生活的突如其来

来的转变成了一件极不寻常的大事情。

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听着！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萨什卡……在一个月内学完了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和算术并考上了矿业学院，你相信吗？你要是相信那才怪呢！不，你一定会打发那个人去见鬼……然而这是真的！卡拉姆芭！这种单调而乏味的事昨天刚刚结束，瞧，我又由一个军人变成了一个大学生！”

法捷耶夫象投入战斗那样投入学习，“象猛狮，象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sup>①</sup>那样，——昼夜学习十五个小时”。在这个时期他同样孜孜不倦地、贪婪地吞食着战后首都生活中丰富多采的一切：上剧院，去综合技术博物馆听卢那察尔斯基的演说，经常留意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参加大学生辩论。这个时期，他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中反映了莫斯科的整个文化生活和一切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政治事件。信写得很匆忙，但是富有生活乐趣，充满幽默。

然而，法捷耶夫的大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学习计划非常庞大，但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下去——学习被打断了，他参加了党的工作。他被调到了电工技术学院，可就在这时候党中央忽然出现了，它硬是动员了一百人到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征收的党员中去做党的教育工作。”

法捷耶夫并不为“学习因此变成泡影”而惋惜。他热爱党的工作，满腔热情地献身于党的工作。这是他爱好的事业。在他的书信里就是这样流露出自豪感的：他是党的战士，党需要他，当党需要久经考验的、可靠的人的时候，他被选中了。他愿意接受党分派给他的任何工作，不管这些任

---

① 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外套》中的主人公。——译者

务有时同他个人的计划产生多大矛盾。还在矿业学院学习的时候，法捷耶夫关于他本人曾经写道：“现在我什么都学。我已经专心致志地钻到各种各样的测量学、各种分析、分析学和矿业技术里”。作为莫斯科河南岸地区区党委指导员兼莫斯科某厂党委会书记的法捷耶夫，只能把这些学习同工作结合起来。

他就是在这时候开始自己的文学试作的。

实际上，“试笔”、“最初的试作”等说法都不能很贴切地表达年轻的法捷耶夫文学活动开始的含义。这些年来，他身上充满的那种对生活、对知识、对工作、对斗争的强烈欲望，在参加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那种对自己的力量和希望的坚强信念都在他最初的创作计划中表现出来了。他连一行字还没有写，就准备一下子创作一部宏篇巨著——一部关于远东革命运动的史诗小说。

后来，这个计划真的实现了。它成了小说《毁灭》和《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的基础。但在当时，在1921—1922年间，不论他身上那股青年人的精力多么旺盛，不论强烈的愿望怎样吸引他，法捷耶夫都能使自己认识到：文学并不是用正面的进攻所能攻克的堡垒，没有长时间的围攻是拿不下来的，必须要从小事做起。

于是，1922年他构思并完成了中篇小说《泛滥》。过了几年以后，法捷耶夫回忆这部小说时以最严厉的词句对它作了评定，说它是“不严肃的、粗糙的作品……小说的材料还很不成熟，未经过提炼，因而也是东拼西凑，莫名其妙的。我只是集中了全部感想和思考，对它们进行了叙述；小说里流露出一些模糊的思想，但其中有很多是不必要的、没有正确理解的、肤浅的东西。”

如果从文学规律的整个严整性来看，应该承认，《泛滥》确实有些不必要的和没有被正确理解的东西，有些材料很粗糙，未经过提炼。不过，就是这些不必要的、没有被正确理解的、粗糙的东西，也能使我们看到作者本人——二十岁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身上一些很有意思的特点。

小说一开始就很有趣，开头几行是这样写的：

“这块土地培植着一百五十万俄亩耸入云天的建筑用木材森林。

“在黑压压的原始森林的上空，永远荡漾着阴郁的、神秘莫测的喧嚣，在下边，靠近粗糙的根部的地方是一片荒野的寂静，在寂静中潜藏着黑熊的笨重的走动；浑身条纹的满洲虎的凶猛的气势以及果尔特老人通洛悄悄走动的情景。枯干的树叶在他那绵软的鹿皮鞋下边发出勉强可以听得见的柔和的沙沙声。

“肥沃的乌拉赫河沿岸滋生出茂密的野草，它们在为更优秀的子孙后代忧悒不安。”

森林上空神秘莫测的喧嚣和荒野的寂静、粗糙的根部和老虎的凶猛，茂密的野草和……经过极认真估算的“一百五十万俄亩……建筑用木材森林”，“更优秀的子孙后代”。这种浪漫主义色彩与求实精神的结合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作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

这儿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合。在形象的、富有表现力的、决不追求辞藻华丽的文体背景上——突然可以看到知识分子那非常文雅的语言：“为更优秀的子孙后代忧悒不安”。紧接着又是纯乡间粗俗的“沙沙声”。

如果这样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小说的行文，可以对作者的性格，他的修养的特点，他的发展水平、志趣和希望等有

一个十分清楚的概念。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另外的东西。当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坚信不疑地认为，无论是浪漫主义的开头，还是附在这个开头的有些求实精神的附加的几笔，在《泛滥》的情节中都起不到什么作用。这种开头和附加的几笔都带有纯粹偶然的性质，而且只是因为在小说中自始至终充满作者的思想、激情和感情的混乱才产生的。

法捷耶夫那时就认识到，一切描述必须服从于一定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小说的情节骨架是经过十分认真的考虑的。不过，很显然，他就是还不善于克服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的自发势力，至少，当情感使他远离了基本思想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坚决。《泛滥》这部小说的主要缺陷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此。可是也真奇怪，小说优点的主要根源也在于此。

实际上，真正才能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善于倾听自己的感觉和情感的呼声并且能如实地表达它们，而不是用生活的或文学的死板公式歪曲它们。善于组织材料的能力和善于把材料所引起的全部情感和思想设法服从于由思想制定的一定程序的能力，是来源于技巧——是完全可以获得的特长。不过，这里所指的还不是这个问题。虽然在《泛滥》中作者情感的“无组织性”使他描述和评价某些现象和人物时往往蒙上一层明显的主观主义的色彩，然而，有时候正是这种无组织性帮助法捷耶夫避免了年轻的作者们在开始阶段常犯的公式化的毛病。

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描写由布尔什维克伊万·涅列京领导的一伙贫农为反对土豪劣绅及其走狗、为争取群众和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当然，前者引起了作者深刻的、同志式的同情，后者引起了他强烈的仇恨。那末，究竟怎样表述这些感情才能使它们具有感染力呢？

至于农村的所有反面人物，也许这个问题，丝毫没有使年轻的法捷耶夫感到伤脑筋。他的做法很简单。假如是众所周知的腐朽阶级的代表人物，那就让他们原原本本表现出自己是真正腐败的人。事情非常清楚，他们之中有的人得了“腐败症”，有的人是由于狂饮无度而活活烂掉，还有些人是骗子、奸商和道德一贯败坏的家伙。

这些人与其说以自己的社会恶习，倒不如说以自己的纯生理上的缺陷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反感。磨坊主瓦维拉的塌鼻梁和一对淌着黄色泪水的眼睛，巴尔科夫老师的一对放射着“对自己怜悯和对全世界仇恨”的浑浊的眼睛和有点发青的、一绺绺从额头上耷拉下来的肮脏的头发。

法捷耶夫为了更强烈地表现自己对这些人的反感，还安排了让瓦维拉向年轻漂亮的姑娘玛丽娜求婚的情节，让巴尔科夫做了一个极为荒唐的家庭的父亲，他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提到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女教师巴尔科娃是一个肥胖的西伯利亚女人，走起路来总是那样慢慢腾腾的，她的肚子很象一个装满粮食的袋子垂下来，——一个星期以后她的第四个孩子降生了。

“另一个儿子——大肚子，前额很低，象他母亲……”

作者在这里，每句话都流露出对这些人物的反感。

创造一个能使读者喜爱的、抓住读者的布尔什维克形象当然是一件更困难的事。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另一些更为完善的艺术表现方法。而在这里还不能说法捷耶夫是根据“只是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印象和思考并将它们加以阐述”的原则来做的。恰恰相反，他的主人公伊万·涅列京的全部活动和他的形象本身都带着作者非常冷静而周密的创作构思的痕迹。既有关于涅列京过去生活的简短的报道，又有他参

加革命工作的全部情节，有他在想望中对社会主义未来的那种美景的描写，甚至还有他对医士米纳耶娃戏剧性的爱情的故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十分严整的体系。

读者逐渐知道，这个人决不是偶然出现在布尔什维克中间的，他虽然生长在农村，却到过很多地方，读过很多书，最主要的是他受过无产阶级的良好锻炼。还在1917年的春天，涅列京从前线回到故乡后，就严格按照他周密考虑过的计划来行动：控制过激的农民活动分子，在乡管理委员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并立即开始进行坚决的革命改造。尽管农民远没有马上响应他的号召，而且他的处境往往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危险，然而，涅列京非常熟悉情况，就在农村最困难的时刻，他成了唯一的能沉着而正确地找到解决办法的人。

“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发生的一切，使涅列京想到了笨重的铁链。必须摸到其中的一个环节并紧紧地抓住它，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把整个链条拖起来。现在这个链环以它纯铁的颜色闪现在涅列京的眼前。”

既然这个链环已经在眼前闪现，涅列京就坚决而果断地行动起来，而主要的是用他自己的榜样来吸引人们。

必须拯救在草地上遭遇洪水的农民家庭，——涅列京走在最前边。

必须为遭到水灾的人们收割庄稼，——涅列京率先拉着自己的父亲一起去干。

无论是他刚开始工作时农民的不信任和富农迫害的危险，还是在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政权面前产生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什么都不能使涅列京半途而废。

同时也暴露了在他的性格方面完全不同的一些品质。

瞧，他正朝着一个村落的米纳耶娃家走去。他从恶意的、嘲笑的目光下走过。这些目光也好，背后的窃窃议论也好，都毫不使他感到难为情和不安。

是他，这个严肃的人，坐在一个患着重病的女人的床边，“感到一种特别的柔情往上涌”，“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双手粗糙而坚硬，手指稍稍有些弯曲。”

是他，知道米纳耶娃已经接近死神，或许已经死去，便断然打消对她的思念，因为刻不容缓的社会工作在等着他去做。后来，筋疲力尽的他，时而乘坐破旧的小船，时而骑马，在漆黑的夜里向她奔去……

如果把有涅列京参与的一些情节联到一起，如果回忆一下作者在插话中谈到涅列京所说的一切，就会形成一个栩栩如生的、鲜明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对此既没有粗俗的描写，也没有明显的美化。这个形象如果不是经过法捷耶夫极周密的思考大概是不会这样成功的。在创作中作者用心的冷静程度有时甚至显得太过分。因此有时使人感到有些矫揉造作。

涅列京得知米纳耶娃死去的消息后，一头扎进了干草棚里，伴着悲伤痛苦一人独处：

“夜间在散发着草香的干草棚里又黑又闷。

“棚顶腐烂的木板使涅列京压抑、难受，无法入睡。从缝隙透进发着清脆动听声响的七月的夜空，既不能为他排忧解愁，也不能使他温暖。这时医士的一对褐色的大眼睛代替了天空；这双忧郁的、含情脉脉的眼睛凝望着他。

“涅列京这只孤独的灰色的小鸽子，为那一对眼睛，为自己的忧伤和爱情在草棚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也不哭泣。”

几天以后，涅列京离开家乡为同村的人买粮食去了……

“在阴森森的教堂后院里隐藏着一个阴郁的、幽寂的公墓。不过，涅列京并没有往那儿看。那里有米纳耶娃的新坟，坟前立着一个对谁都没有用的、发白的新十字架，——何必去触及已经愈合的伤疤呢。”

主人公此时此刻想些什么呢？他在想，“坚硬的钢轨将来会架过乌拉兴山谷……电力拖拉机将初次深深地翻起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等等。

假使作者本人被极力想唤起读者对主人公悲切的那种感情所感染，他就不会注意到发着草香的干草棚和使涅列京压抑难受的棚顶腐烂的木板，也就感觉不到七月夜空那清脆动听的声响。他会发现另外一些比过分伤感的“孤独的灰色小鸽子”更符合涅列京的内在品格的语言。

不过，所有这些细节并没有给涅列京的形象带来很大损害，青年作者的不合逻辑性却使这一形象受到更大损害。他那青年人的直率和过分激动的感情全是从这种不合逻辑性那里来的。

在《泛滥》中有一个描写土豪劣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隐蔽斗争表现为公开的搏斗的情节。从构思来看，这是在那些年月常见的阶级冲突之一，从具体体现来看，是一次普通的、用拳头进行的格斗。“拳头象铁锤一般挥动起来，打得颧骨啪啪作响，节日的盛装被撕破了，野兽般的怒吼声笼罩着人群……”

这种搏斗之所以感染年轻的法捷耶夫，也许只是由于体育狂热。他愉快地描述了涅列京的同志哈里顿·基斯雷伊怎样运用自己巨大的拳头，涅列京本人怎样用“那干式手枪枪柄狠揍厮打着的人们”。那干式手枪“是图拉厂的产品，深

蓝色，非常好使”。但是，由于作者过分激动却没有注意到，无论是涅列京本人，还是他的同志们在这种实在令人讨厌的场面中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好感。

在这个情节里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这里第一次流露出对那时的法捷耶夫来说特有的、对群众一切无组织和自发行动的反感情绪。可是，这对涅列京的形象有什么关系呢？事实证明有着直接的关系。

问题首先在于法捷耶夫无形中以这种反感影响了他的主人公。他没有去表现指导着主人公活动的另一些感情。涅列京在同一切反面人物进行斗争时，并没有用任何语言，或用任何行动向那些他为之而战斗的人们表示过什么同情。甚至拯救快被洪水淹死的难民也似乎仅仅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以及因为这正是抓住了能把事件的整个链条拉起来的那个环节，他才这样做的。

很自然，涅列京在小说中真的成了一只“孤独的，深灰色的鸽子”。支持他的几个人——除了哈里顿·基斯雷伊以外，都是些一晃而过的、平淡无奇的人物。而所有的农民群众也是作为一种很不象样的、盲目的力量同涅列京相对立，对这种力量必须加以驯化，而且他最终确实把它驯服了。对于参加革命斗争的布尔什维克来说，就是这种反常的孤僻给涅列京的形象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话又说回来，其他方面的原因也使这一形象受到不少的损害。

在《泛滥》中有一批多少有点儿特殊的人物。这就是护林员日美霍夫、他的妻子玛丽亚和女儿卡尼娅、林务技术员安东·杰格佳列夫及牧师季莫费，他们都是反抗土豪劣绅的劳动人民。